

社会与政治过程的交易解释： 评查尔斯·蒂利的《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

蒋红军*

查尔斯·蒂利著,谢岳译(2008). 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共 280 页.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他在有关政治与社会过程、社会运动、民族-国家理论以及欧洲史等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国内学术界在最近几年才开始逐步重视和引介这位学术巨人的思想(董国礼, 2007; 陈健, 2009), 因而他的学术著作也陆续有了中文译本。

《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由蒂利在过去十几年里完成的 15 篇论文构成,虽然每篇论文论述的主题不同,然而,综合来看,它的中心思想则集中表现为“视人际交易为社会过程的基本要素,展示人际交易如何复合成身份、如何产生与转变社会边界以及如何累积成为持久的社会联系”(第 4 页)。蒂利在该书中集中论述了社会与政治过程的交易解释路径,不仅提出了理论框架,更以两类特殊的政治过程加以分析论证,显示出娴熟的理论抽象能力。

对于社会与政治过程的一般性解释,蒂利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系统解释、意向解释与交易解释。“进行解释就是提供一个机制,即打开一个黑箱并显示那些引起了聚合这一结果的螺母和螺栓、嵌齿和齿轮、欲望和信心”(乔恩·埃尔斯特, 2008: 5)。因而,三种解释

* 蒋红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类型又被称为三种解释机制: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与关系机制。它们之间是一种解释的竞合关系。与系统解释和意向解释相比,蒂利提倡使用交易解释来分析社会与政治过程,是因为交易解释具有很强的解释优势。

系统解释的理论来源于生物学、控制学等不同学科,以马林诺斯基、帕森斯以及伊斯顿的研究为代表。系统解释的优势是便于将小规模和大规模的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进而构建巨型的系统理论,其明显缺点则是对系统内部的原因与结果很难分辨清楚(第16页)。意向解释是站在意向的立场上,在意向系统合理性预设的前提下,通过对命题态度(即信念、欲望等意向心理状态)的归纳,给出合适的理由,从而达到其解释的目的,完成其解释的功能(王姝彦,2006)。意向解释的优势在于分析那些主要涉及个人层次的社会现象,而其最大的不足则是没有能够很好地说明社会过程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的集合效果(第16页)。

“交易解释是把社会场所之间的互动作为它们的起点,把那些场所之中的事件与那些场所的持久特点看作是互动的结果”(第16页),其解释过程存在三个前提假设:一是赋予社会场所以及社会场所内部的个人、团体和社会联系以信息、资源及能量,促使它们相互沟通,参与场所之间的交易及互动;二是无论个人还是集体,他们的意向(动机、情感、信念等)都来源于人际交易,这些人际交易实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约束与被约束关系过程;三是挑选具有显著特点的片段、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力求找出循环出现的机制,以便解释复杂的社会与政治过程。因而,这种解释方式具有解释目标适度、同时关注个人及团体的意向和行为、注重寻找和区分重要因果关系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既体现了系统解释与意向解释的优势,又部分地弥补了它们在解释上的不足之处。

为使用交易解释的方法来开展社会科学研究,蒂利在书中把“交易”等同于“关系”,即将关系机制视为交易解释的一种替代,并

提出一个以“边界、联系与身份”为核心的理论框架,用以展示这样一个分析逻辑:假设 X 与 Y 分别代表的是一个团体、活动或是社会场所,那么它们内部的不同关系刻画了彼此的异质性,在 X 与 Y 相互接触、彼此转换时,边界与跨边界的关系也就产生了;不管是 X 范围内的关系、Y 范围内的关系,还是跨越 XY 边界的关系,它们共同创造了有关你-我(或我们-他们)各自的或彼此间的共享记忆、故事;综合起来看,这些边界、跨边界关系、边界内的关系以及共享故事就构成了集体身份,正所谓“身份是一组有力的社会安排,在这种安排里,人们建构有关他们是谁,他们如何联系和对他们发生了什么共享故事”(第 221 页)。关系、边界、共享故事与身份共同构成蒂利交易解释理论框架的四个要素,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其中任何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比如,划分社会边界的过程意味着构建新的身份,表达身份的声明与诉求也意味着构建新的社会边界。

《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蒂利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上述的交易解释理论框架。第二至第五部分虽然论述议题较为散乱,分别是关系机制、不平等、边界与政治边界,但是,认真分析这四大部分的逻辑关系和主题勾连,蒂利实质上在重点论述两个问题,即抗争政治与民主化问题,并给出了它们的关系机制解释,以论证其理论框架的有效性与自洽性。抗争政治涉及暴力冲突和社会运动,民主化则与不平等、公民身份密切相关,蒂利对它们都有较为深刻的分析。

其一,抗争政治的关系机制。暴力冲突与社会运动是抗争政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蒂利将它们视为集体行动的结果,并用关系机制对它们的发生、传播与变迁进行了解释。既然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蒂利就不得不首先解决这些集体行动面临的规范逻辑问题——集体行动何以成为可能?这正是蒂利用专门章节论述利他主义的重要原因。

基于对行动者或他人的伤害和好处,蒂利将个人选择分为利己主义、合作、利他主义及破坏。在直接引证马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蒂利不仅论证了利他主义与破坏确实存在,而且指出四种机制促进了利他主义或破坏:首先是直接的外部强迫;其次是在一个网络和过程内部的相互强制,这种强制通过阻止私下沟通和退出的方式获得了有效性;再次,透过共享故事的激活,该故事排斥背叛行为;最后,存在着对共享身份与信任网络生存的外部威胁。这样的分析路径对于利己主义与合作同样适用,这就为暴力冲突与社会运动的发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针对暴力冲突,蒂利的解释似乎较为简略。他认为,爆发暴力冲突的原因是,在我们-他们的边界之间,有关交易的不确定性变化,对暴力与非暴力集体互动之间的转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作为第三方的政治权威的能力变化,边界各方力量及秩序变化等等;对于社会运动,蒂利认为,社会运动至少涉及三个当事方:一群自发的诉求者、某些诉求目标和某些公共权威。从社会运动的发生学来看,社会运动是从诉求者行动、诉求目标以及公共权威的互动中产生的。社会运动的发展还深刻地改变着抗争政治过程。一方面,社会运动涉及集体身份的声明和诉求,这些诉求的实现必然带来社会边界的变化,形成新的共享故事与新的集体身份;另一方面,公共政治权威如何回应社会运动,对社会动员的机会和资源,进而对原有社会结构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二,民主化的关系机制。在分析民主化之前,蒂利首先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定义了民主,与实质性民主定义、制度性民主定义等不同,民主在书中指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保护性协商。因此,民主化指的是向保护性协商的移动,而去民主化则是指向保护性协商的反向移动(第37页)。那么,民主化是如何实现的?通过观察和研究,蒂利提出了民主化的关系机制,即民主化出现在三个彼此可

以分开而又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公共政治、不平等和信任网络——的互动变化之中。上述三个互动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边界与社会联系的任何变化都将影响到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言之,三类机制与过程促进了民主化:一类是影响类型不平等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第二类是影响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第三类则主要是在公共政治范围内运转(第38-41页)。

在民主化的政治过程中,限制不平等与有效的公民身份是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不平等起源于非对称的社会互动,在那里,优势积累在一边或另一边,它受到维护与支持不平等优势的社会类型的加强”(第107页)。不平等出现之后,剥削、机会累积、效仿和适应四个关系机制共同促使建立非对称社会互动的边界,并透过能力与关系的不同积累、类型不平等的奖赏,达到巩固原有边界,从而形成持久不平等的局面。不平等对民主化有着深刻的消极影响。从本质上看,民主化的前提是公民的平等和自由,它追求的是与不平等截然相反的价值。不平等对保护性协商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要实现民主化,不仅需要打破类型不平等的边界,促进公民的平等政治参与,而且需要将公共政治、信任网络从类型不平等中分离出来,建立新的集体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

另一方面,有效公民身份是民主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作为对抗不平等的一套制度安排,蒂利认为,公民身份是由一系列相互强制执行诉求构成的,这些诉求是人群类型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第205页)。并且,所有国家都明显通过两种方式构建公民身份:一是在公民身份的类型与程度中间作出区别,它们隐含着不同的权利、义务和与政府的关系;二是公开宣布一般的权利与义务安排,这种安排实际上在运用于一个国家民众的不同部分时明显不同(第204页)。历史地看,西方社会构建公民身份大体上符合前一种方式,个人或群体为追求公民身份,社会运动浪潮迭起,展现了为公民身份“从无到有”而斗争的社会政治过程。透过公民身份的声明

与诉求,处在边界一边的下层阶级(或弱势群体)可以开展打破不平等边界的斗争,重新划分边界,建立新的社会联系,直至最终实现公民身份的理想,抑或建立一种更平等的集体身份。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政治生活尤其如此,但是,一旦我们知道如何观察社会政治生活,社会与政治变迁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蒂利的交易解释方法就是这样一把学术的金钥匙,用于指引人们的日常观察和学术研究。其实,如果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到中国经验,就会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交易解释理论框架的四大要素。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处在转型社会中的个人或集体拥有的身份越来越复杂多样,凭借这些多样化的身份,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联系也大大超越了传统社会。然而,现今中国社会的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身份(如城镇居民与农民),背后承载着众多的故事,它们不仅是一种归属感认同的象征,更是拥有多少资源、权力、知识的象征。这种因身份带来的差异在不同的地方形成了各种不平等类型,进而划分出了众多的社会或政治边界。因此,在交易解释的观照之下,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经验来构建本土的分析与论述,是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与此同时,蒂利在书中的分析论证带有典型的西欧经验色彩,中国经验与之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对这些差异带来的分析限制,研究者也应该谨慎对待。抗争政治在西欧往往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组织化程度较高,其结果也时常导致原有社会边界的变化。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抗争则多是个体开展的、分散的、无组织的、小规模持续性抗争,个体利益的实现程度是衡量抗争成败的关键,很少改变原有的社会边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类似于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抗争,即透过“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来开展抗争(詹姆斯·C. 斯科特,2007)。进一步言之,有学者认为中国弱者的抗争方式既不是采取常规的分散的日常抗争方式,也不是采取激

进的集体行动,而是运用“韧武器”——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武器,采取非对抗性抵制方式,选择“不给被‘拿走’(剥夺)的机会”的做法,并借助“集体(合作)力”的效应,从而使问题公共化,使行动具有合法性——开展抗争(折晓叶,2008)。在民主化方面,中国构建公民身份的历程与西欧相异,更符合两种构建方式中的后一种,呈现出部分群体为追求公民身份“从虚到实”而抗争的社会政治过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者将西方的理论用于观察和研究中国,在社会科学中处于补课的阶段,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研究者不能只开展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政治研究,而要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从而增强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理解深度。

参考文献

- 陈健(2009). 制度变迁的环境与路径——查尔斯·蒂利的国家理论评析. 理论界,2.
- 董国礼(2007). 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运动研究——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 学海,5.
- 乔恩·埃尔斯特(2008). 理解马克思.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姝彦(2006). 意向解释的自主性. 哲学研究,2:92-98.
- 詹姆斯·C. 斯科特(2007). 弱者的武器. 南京:译林出版社.
- 折晓叶(2008). 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 社会学研究,3:1-28.